

跨语言文化研究

Cross-Linguistic & Cross-Cultural Studies

第四辑

主 编 张京鱼

副主编 王 文 田 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工程”建设项目

跨语言文化研究

Cross-Linguistic & Cross-Cultural Studies

第四辑

主 编 张京鱼

副主编 王 文 田 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语言文化研究. 第四辑 / 张京鱼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 - 7 - 5161 - 0747 - 8

I. ①跨… II. ①张… III. ①语言学 - 研究②文学研究 - 世界
IV. ①H0②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539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刘娟
责任印制 李建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378 千字
定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语言与文化

- 英汉动结式之参数差异 张京鱼 (3)
- 试析日语 V + V 复合动词的语义特征 乐燕子 (26)
- 代词与言语礼貌 王春兰 (33)
- 英汉方位隐喻研究——以“up”“down”为例 张志强 (39)
- 名物化与非英语专业学生议论文写作质量的相关性研究 ... 樊 静 (49)
- 歧义容忍度与大学英语中学习策略选择的相关性实证
研究 刘 薇 (61)
- 语言能力和语言形式对中国 EFL 学习者语言语用意识的
影响 李若子 (69)
- 英语专业免费师范生自主学习能力调查研究 刘 丹 (79)
- 对陕西省研究生英语学习策略使用状况的实证研究
..... 唐麦玲 牟生调 (87)
- 中国学生英语写作中词汇语体与文化问题分析 张春娟 (98)
- 二语心理词汇研究综述 石洛祥 (105)
- 由电影《阿基拉和拼字比赛》谈英语词汇习得 荣 亮 (115)
- 英语学习词典：查阅者、编纂者、研究者 郭 丽 田 兵 (122)
- 现代俄语计算机俚语的构词学分析 孟 霞 (133)
- 从违反合作原则角度看修辞论辩 段李敏 (142)
- 试以符号学解读中国原龙文化 孔祥学 (150)

文学与文化

- 理查：莎士比亚笔下的暴君和恶魔 孙 坚 (159)
-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吴宓文化观透视 郭英杰 (167)
- 论莫言的虚构家族传奇小说
——兼及“我爷爷”、“我奶奶”等复合型人称视角
..... 王西强 (173)
- 文本审美与历史政治的结合
——多角度评析《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 吕竞男 (179)
- 生前一把辛酸泪，身后诗书传千秋 胡选恩 (187)
- 古典文学性质史学的散议 许文军 (193)

翻译与文化

- 鲁迅的“硬译”与“中间物意识” 李文革 (209)
- 翻译职业化下的翻译发展新进程 潘 婧 (219)
- 翻译研究中的“语境”：从缺失到泛化 张霄军 梁亚卿 (226)
-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理论教学中的洋为中用 闫军利 (232)
- 师范类高校外语专业翻译教学刍议 徐晓敏 (237)
- 博士英语入学考试英译汉试题分析 马乐梅 (243)
- 佛教在日本各历史时期的表征 刘卫刚 (255)

语言与教学

- 对外语教材中引入中国文化可行性的思考 兰 军 (267)
- 大学英语听说教材语体特征研究 杨 倩 张 玲 (274)
- “国培计划”教师培训模式及效果的实证调查 高 芬 (284)
- 显形语用教学与有效英语交际 习青侠 (294)
- 合作学习在非英语专业英语口语教学中的作用 王 蕊 (302)

网络平台及自主学习的新模式:	
研究生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及思考	高延玲 (310)
有效教学理论下的主题式一体化英语网络教学模式	
探究	刘 丹 (316)
基于课堂与网络的大学英语 RECD 教学模式的建构	崔 琳 (324)
免费师范生学习动力分析	雷 震 (333)
大学英语学生需求研究	李 洁 (342)
大学二年级精读课程中“听说”训练的强化实践	张 灵 (349)

英汉动结式之参数差异

张京生

语言与文化

摘要：在对英汉动结式参数差异的对比研究中，动结式被引入到构式语法理论无关系的词法基本理论。英语动结式与汉语动结式在构式参数上的差异不同。英语选择的是动词投射的构建方法，动词在词法上已经通过尾结构进行了词汇化过程，具有统一投射属性（UPP），而汉语动结式在词法上没有词汇化，没有词汇单元，缺乏UPP特征，单元是句法结构中的功能

限制之参与者定律得以推论。

关键词：动结式；题元关系；直接宾语限制；词汇化参数；统一投射属性；句法解释性

一、引言

动结式由于其能揭示词汇语义学的本质，以及在句法和语义接口的研究中所扮演的作用，在当代语言理论建设中处于一个中心位置，吸引了生成语法和构式语法两个学术流派的众多研究者。如黄正德（Huang, 1988, 1992, 2006）、李亚飞（Li, 1990, 1995, 1999）、董正德、李亚飞与黄正德（Huang, Li, & Li, 2009）、顾阳（Gu, 1992）、吕明典（Lü, 1992, 1999）、拉莫与拉帕波特-哈文伍（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 Rappaport Hovav & Levin, 2001）、林家宗（T. H. J. Li, 2001）、克拉泽尔（Kramer, 2003, 2005）、林吉米（J. Lin, 2004）、恩比克（Embick, 2004）、罗恩斯坦（Rohstein, 2004）、威廉姆斯（W. Williams, 2003, 2009）等。在构式语法研究中，研究者如戈德伯格（Goldberg, 1995）、戈德伯格与杰肯施佩（Goldberg & Jackendoff, 2004）、王玲玲（2009）、熊伟儒（2004）、赵琪（2009）等。

动结式涉及两个事件：传统上称作致使事件（causing event）和结果

英汉动结式之参数差异

张京鱼

摘要:在对英汉动结式研究中我们发现动词投射和结构语境引入是构建题元关系的两种基本机制,语言之间的不同在于对这两种构建模式的选择不同。英语选择的是动词投射的构建方法,动词在词库里已就其论元结构进行了词汇化过程,具备统一投射属性(UPP);而汉语动词在词库里没有词汇化,没有词汇论元,缺乏UPP特征,论元是句法结构中的功能范畴引入的。汉语动结结构构式整体指派原型施事和原型施事,直接宾语限制之辛普森定律得以维系。

关键词:动结式;题元关系;直接宾语限制;词汇化参数;统一投射属性;句法解析性

一 引言

动结式由于其在揭示词汇语义学的本质,以及在句法和语义接口的研究中所扮演的作用,在当代语言理论建设中处于一个中心位置,吸引了生成语法和构式语法两个学术流派的众多研究者,如黄正德(Huang, 1988, 1992, 2006),李亚飞(Li, 1990, 1995, 1999),黄正德、李艳惠与李亚飞(Huang, Li, & Li, 2009),顾阳(Gu, 1992),喜碧斯玛(Sybesma; 1992, 1999),拉雯与拉帕伯特—哈文伍(Levin & Rappaport Hovav, 1995; Rappaport Hovav & Levin, 2001),林宗宏(T.-H. Lin, 2001),克拉泽尔(Kratzer; 2003, 2005),林吉米(J. Lin, 2004),恩比克(Embick, 2004)罗思斯泰恩(Rothstein, 2004),威廉姆斯(Williams; 2005, 2009)等。在构式语法研究中,研究者如戈德伯格(Goldberg, 1995),戈德伯格与杰肯多夫(Goldberg & Jackendoff, 2004),王玲玲(2000),熊仲儒(2004),赵琪(2009)等。

动结式涉及两个事件:传统上称作致使事件(causing event)和结果

事件 (resulting event)。威廉姆斯 (2005) 称前者为手段 (Means), 后者为结果 (Result), 并将动结结构界定为一个由手段 (M) 和结果 (R) 两个显性述语组成的句子, 且这两个述语没有一个是由于连词或者置位词引入的。动结结构描述一个变化, 此变化以 R 所界定的状态为终结, 由 M 所描写的事件的手段所达成。汉语动结式是连续性的, 即 M 和 R 组合在一起, 我们沿用威廉姆斯的标记 “M/R”, 宾语 (O) 紧随其后; 英语的动结式是非连续性的, 即 M 和 R 之间由 O 隔开。动结式不论是连续性还是非连续性的都是复杂致使结构。英语中的 R 是短语性的, 多为形容词短语或介词短语, 而汉语中的 R 只是动词性的中心词, 而不是一个短语。其实, 汉语不仅有核心词性也有短语性的, 只是短语性的动结式需要显性“得”的引入, 本文不作讨论。^①

对英汉动结式的研究分歧主要在于所涉及的句法与语义接口上, 具体而言在于动结式所涉及的题元关系与两个组成述语个体以及动结构式整体所表达的事件之间的关系, 论元选择与解读等问题。动词的配价问题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一直受到语言学届的关注。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动词投射题元关系, 其基本的假定是将有关句子结构的所有信息都归并于动词就可使组合句子的规则保持简单, 如乔姆斯基 (Chomsky, 1981)、布里思南 (Bresnan, 1982)、道迪 (Dowty, 1989)、斯迪德曼 (Steedman, 1997) 以及乔希 (Joshi, 2004) 等。但是, 挑战这一投射论之主张而支持动词语境之作用的观点越发普遍, 如卡尔森 (Carlson, 1984)、马兰慈 (Marantz; 1984, 1997)、鲍尔 (Borer; 1994, 2003)、戈德伯格 (1995)、克拉泽尔 (1996)、罗思斯泰恩 (2001)、皮尔特罗斯基 (Pietroski, 2004)、威廉姆斯 (2005, 2008) 等。但是这两种构建题元关系的方法, 从动词投射与由动词语境施加, 正像威廉姆斯 (2005) 所说的实证上很难区分。在对汉英动结式研究中, 也表现出以黄正德为代表的投射论者, 和以威廉姆斯为代表的动词语境论者。有趣的是这两种构建题元关系方法不同, 但结论却殊途同归: 汉语动词无论元, 在主语和宾语选择上未完全指定 (underspecified), 而英语动词在词库里已被“病毒”感染, 具有严格的论元结构, 表现出严格的选择性 (specified selection)。

^① 古汉语和英语一样, 动结式是非连续体的, 如: (i): (i) a. 寡妇哭城颓。(《乐府诗集·懊侬曲》) b. 风吹窗帘东。(《乐府诗集·华山畿》)

英汉动结式结构很有代表性，一个是连续体的，另一个是非连续态的，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我们的语言理论，而且对语言可习得性问题的解决给予启迪，更有助于提高二语教学的效果。我们从英汉动结式语言之间的差异开始，分析介绍对英汉语言间的差异的解释，纵观对英汉动结式的几个解释，原因似乎是于 Huang 的解析性和合成性参数，汉语动词无论元理论，以及二林 (T. -H. Lin & J. Lin) 的词汇化参数和事件结构理论。

二 英汉动结式的差异

首先，例 (1) 里汉语句是动结结构，而英语句不是动结结构，尽管表层结构一样：

(1) The swollen river washed away the footbridge.

不断上涨的河水冲垮了人行桥。

汉语“冲垮”是“VV”动结复合词，其句法行为符合动结式的定义。英语动词短语 *wash away*, *wipe out* 都与 *destroy* 同义，意为“破坏”，其中的 *out* 和 *away* 都是小品词，而非介词，可以移位，如例 (2)：

(2) a. Flood Wipes Out Bridge in Oronoco, Minn. (新闻标题)

b. The floods wiped whole villages out.

例 (1) 说明尽管英汉里都有动结式，但两种语言使用的动词结构不一样。动结式就是像例 (3) — (6) 的结构：

(3) John hammered the metal flat.

张三把那块金属砸平了。

(4) Ozzy sang his throat hoarse.

欧斯唱哑了嗓子。

(5) Dai ran * (himself) tired.

戴宗跑累了。

(6) The riveri froze ti solid.

河 (水) 结冰了。

例 (3) — (4) 里，英汉语都有宾语，如例 (3) 里的 *the metal*，例 (4) 里的 *his throat*。在对英语复杂致使结构的研究中，辛普森 (Simpson, 1983) 发现表结果的述语的语义总是指向动词的直接宾语。拉雯与拉帕珀特 (1995) 后来把这一发现发展为直接宾语限定条件 (Direct Object

Restriction): 动结式的结果补语应以宾语为其语义指向。例(5) — (6)似乎构成了对DOR的反例,其实不然。例(5)英语句如果没有这个称作“假自反代词”的himself,句子不合语法,而汉语句加上这个假自反代词“自己”就显得画蛇添足,别里别扭。例(6)与(5)表层结构有点相像,却可以不加itself而成立。词汇语义学告诉我们(5)和(6)句子结构不一样,主要是由于两个动词不一样。例(5)里run“跑”是非作格动词,而(6)里的froze“冻结”是个非宾格动词,根据非宾格假设表层主语the river其实是其底层宾语 t_i 位置提升到主语位置的,这点从其致使句式(7)就可看出:

(7) The cold winter froze the river solid.

寒冬使河水结冰了。

寒冬把河水冻成冰了。

像下面(8) — (11)中,汉语都采用的是动结式,而英语没有对应的动结式,要表达汉语句式的意义,必须采用释义的方式:

(8) 李四笑疯了。

Lee became crazy from crying.

(9) 卖花姑娘冻病了。

The flower girl got ill from being cold.

(10) 黛玉哭湿了手帕。

Daiyu made the handkerchief wet from crying.

(11) 这件事哭红了李四的眼睛。

This matter made Lee's eyes red from crying.

英汉动结式的研究就是要解释(3) — (11)中所表现出的异同。^①与英语动结式相比,汉语动结式的解读显得尤为复杂。针对汉语是否遵循直接宾语限定条件,学界有明显的分析。黄正德(2006),林吉米(2004)和黄正德、李艳惠与李亚飞(2009)等认为汉语DOR反例很多,汉语不仅存在无宾语的非作格动结式,而且允许非作格动词使役化。例(8)中“笑”显然是个非作格动词,但与英语不同,虽没有伪反身代词

^① 汉语的有些动结式还有歧义,如:王五追累了小偷。此句的缺省解读是王五追小偷把小偷追累了,而它还有第二个解读:王五追小偷把他自己追累了,如当王五是个中老年人,而小偷是个年轻人时可能发生的情况。由于篇幅,歧义动结式本文不作讨论。

的支持,也是合乎语法的,且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为主语。而威廉姆斯(2005, 2008)认为汉语也遵守DOR,对汉语反例的解释是外部角色分析。DOR是否是一个普遍原则,UG的一部分?正像黄正德(2006)讲的,对待这一问题方法有二:如果假定DOR是UG中一个正确的原则,那么汉语语言事实对其构成挑战需要给予解释。另一种方法就是不作以上假定,那么汉语事实所构成的问题就不会出现。这正是黄正德(1992),郑礼珊与黄正德(Cheng & Huang 1994),黄正德(2006),黄正德、李艳惠和李亚飞(2009)等采取的办法。威廉姆斯的外部角色分析给我们指出了另一条路子,动结式总是指派一个外部受事论元,这个外部论元在及物句里是在宾语的位置,而在不及物句中,这个外部受事论元处于主语位置。如此汉语的所谓反例就不成立,DOR得以维系其普遍性。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鉴定汉语动结式与DOR的关系。动结式的论元解释需要生成和构式语法及其他流派共同面对的问题,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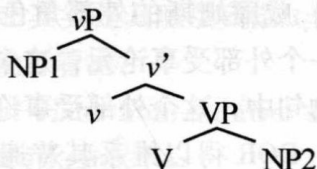
三 词汇化参数与句法解析性参数之解释

对汉语动结式的研究比较早,而且影响颇大的研究者当推黄正德先生。从1988年在*Language*上发表的文章*Wo pao de kua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到他2008年的《从“他的老师当得好”谈起》一文,他采用的理论框架都是词汇分解(lexical decomposition)和核心词移位。词汇分解理论,黄正德(2008)称作“词义分解理论”,起源于生成语义学派,以麦考雷(McCawley, 1969)和道迪(Dowty, 1979)为代表,主张在词库部分加上词语分解标记,以增强生成语法的解释力。拉森(Larson, 1988)将词汇分解的思想应用到对双宾语动词的解释,首次提出轻动词的概念和结构,即拉森的*vP*壳结构。与此同时,黄正德(1988, 1992)也提出类似的结构解释汉语中涉及核心词移位的复式述语现象,如(1)这件事激动得李四流出了眼泪;(2)张三哭得李四很伤心;(3)张三打了李四一个耳光。词汇分解理论因黑尔与凯瑟(Hale & Keyser, 1993, 2002)得以推广。按照黑尔和凯瑟(1993),句法可分为词汇句法(*l-syntax*)和句子句法(*s-syntax*)两种。在对名物化的研究中,黑尔和凯瑟沿用拉森(1988)的动词壳理论,并引出了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因子,CAUSE和BECOME,如:

(12) The cook thinned the gravy.

[VP₁ NP [V₁' CAUSE [VP₂ NP [V₂' BECOME [AP A]]]]]

概念因子 BECOME 到 CAUSE 不带语音成分，必须得到语音支持，促使形容词短语循环向上合并，最终动词化而形成表层结构，同时也形成了它的论元结构。英语里，这一合并是在词汇句法层面，而非在显性句子句法层面运作的。拉森（1988）和黑尔、凯瑟（1993）所设计的空核心的壳结构在最简方案（Chomsky, 1995; Radford, 1997）中又衍生为一种功能语类，最简方案中称之为 *v*P 壳结构：



在 *v*P 壳结构中，嵌套在 VP 之上的是一个轻动词词组 *v*P，它的核心 *v* 是一个具有词缀性质的功能语类，呈强语素特征，可以触发下层 VP 中的 V 移位且并入 *v* 形成 [V-*v*] 来核查自身的特征。轻动词 *v* 的功能在拉德福德（1997）中得到了扩充，被赋予了一定的事件语义功能，用以推导英语中的各种动词类型。黄正德（1997）和林宗宏（2001）发展了最简方案框架内的轻动词理论，赋予了轻动词更多的事件语义功能。所谓轻动词，在语义的层次上是指内涵单纯并为许多动词所共有的“因子”语义。依据动词的种类，轻动词的语义可以归纳为 CAUSE、BECOME、DO 和 BE/HOLD 四类（黄正德，2008）。林宗宏（2001：287）认为汉语中的轻动词主要包括主语选择性和宾语选择性两类，用以解释汉语中为何普遍存在主语无选择性和宾语无选择性现象：

(13) 主语无选择性

- a. 老张开来一辆坦克车。（施事主语）
- b. 高速公路上开来一辆坦克车。（存现主语）
- c. 这辆坦克车开得我吓死了。（致事主语）

(14) 宾语无选择性

- a. 吃牛肉面（受事宾语）
- b. 吃大碗（工具宾语）
- c. 吃馆子（地点宾语）
- d. 吃了一嘴油（结果宾语）

为了解释汉语的主语和宾语的无选择性现象，林宗宏提出了一个假

设：汉语动词不选择论元，论元是由轻动词选择的。语言间的差异是由于词汇—句法层面的轻动词结构在整个短语结构中的不同高度，即所谓的词汇化参数（Lexicalization Parameter）所致。英语中，轻动词结构位置最高，形成了词汇性质的合并，动词在词库中通过这一运作形成了严格的论元结构，也就是说英语的轻动词结构是在词汇句法中形成的。汉语里轻动词结构位置很低，动词从词库里直接进入了句子—句法，参与合并；因为动词在词库中没有严格的论元结构，可以和任何轻动词合并。换句话说，汉语的轻动词结构是在句子句法中形成的。^①词汇性参数，即动词在进入句子句法前是否携带严格的论元（结构）是英汉语在论元选择灵活性方面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威廉姆斯（2005）也独立地发展了他的无论元理论（见下文）。根据王琼、伍雅清（2005），林宗宏的轻动词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英语的轻动词是语素性质的，所以必须在词汇—句法合并中像词缀一样与动词词根附着在一起；而汉语中的轻动词是语义性质的，是纯语义谓词，可以直接进入显性句法操作，或合并或移位。

词汇化参数只是黄正德所称的现代汉语高度解析性的一个表现。高度解析性语言的特质之一是每一个语义单位都以独立的词项来表达。轻动词不再是空语类或词缀，而是像“使、弄、搞、做、打”等实词。因为核心词不能移入轻动词位置，所以就没有施受同词的情况。他的更宏大的参数是句法解析—合成参数。根据黄正德（2008），相对于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英语一样有相当丰富的 L-Syntax，许多动词可以在词汇部门派生而成，如“电、渔、戏”，*phone, fish, joke* 等都可以做动词用，其来源都是词法派生。现代汉语缺少相应的派生词法，所以用“打电话、捕鱼、开玩笑”这类复杂述语来表达同样的概念。

英汉动结式的另一大差异是汉语动结式似乎违反 DOR，R 指向主语而非宾语，如（8）“李四笑疯了”，“笑”是非作格动词，“疯了”语义指向主语“李四”，不用伪自反代词“自己”的帮助而合法。但是（8）也可以加上自反代词自己，只是像（5）一样不能直接加，而要“把”字的帮忙，如（15）：

（15）a. 戴宗把自己跑累了。

b. 李四把自己笑疯了。

^① 林宗宏（2001）还认为，日语中的轻动词结构是在词汇和句子句法之间形成的。

例 (15) 至少在笔者的陕西方言中可以接受, 这是汉语也遵守 DOR 的证据之一, 下文还将论述。吕叔湘 (1987) 说“胜”和“败”, 例 (16) 和 (17) 选用的谓词不同, 古汉语是单音节词“胜、败”, 现代汉语是“打胜、打败”, 但表达的意义相同:

(16) a. 中国队 (打) 胜了韩国队。(及物动词)

b. 中国队 (打) 胜了。(非作格动词)

(17) a. 中国队 (打) 败了韩国队。(致使动词)

b. 韩国队 (打) 败了。(非宾格动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打)胜”是非作格动词, 而“(打)败”是非宾格动词。因此汉语和英语一样, 动词也有作格和非作格之分。汉语离奇的地方是作格动词可以使役化, 如 (18):

(18) a. 李四笑掉了大牙。

b. 这件事笑掉了李四的大牙。

要解释这些汉语句子, 黄正德 (2006) 引用了邓思颖 (1997) 参数差异。在鲍尔 (1983)、乔姆斯基 (1995)、福井 (Fukui, 1995) 的功能化范畴参数化假设 (Functional Parameterization Hypothesis) 的启发下, 邓思颖 (1997) 提出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差异源自在汉语中小代词 Pro 主语和结果 V2 可以一起出现在动结结构里, 即 [Result Pro V2], 而此可能性在英语里不存在, 而这差异反过来来自汉语结果部分紧上面存在一个功能语类 F, 而该 F 在英语的结构中不存在, 如 (14) 所示:

(14) a. [_{vP} Subject [_{v'} v [_{VP} Object [_V V1 [_{FP} F [_{Result Pro} V2]]]]]] (及物格局)

b. [_{vP} Subject [_{v'} v [_{VP} V1 [_{FP} F [_{Result Pro} V2]]]]] (非作格格局)

根据黄正德 (1992) 之概化控制理论 (Generalized Control Theory, GCT) 小代词 Pro 需要被最近的潜在先行词控制, 与罗森保姆 (Rosenbaum, 1967) 的最近距离原则 (Minimal Distance Principle, MDP) 一致。在 (14a-b), F 是作为 Pro 的管辖者 (governor) 而存在, 因此使 FP 成为其管辖范畴 (governing category, GC)。GC 自身缺乏 Pro 的潜在先行词, 因此 Pro 的控制辖域便是主 _{vP}。依据 GCT 和约束理论 (binding theory), Pro 在其 GC, 即 FP 是自由的, 而在 (14a) 里受宾语约束, 而在 (14b) 里受主语约束。因此, 汉语及物和非作格格局都是合法的。而英语里缺乏

FP, 非作格格局的结构如 (15):

(15) [*vP* Subject [*v'* *v* [*VP* *V1* [*Result* *Pro* *V2*]]]]

在 (15) 的结构里, 主动词 *V1* 直接管辖 *Pro*, 所以 *vP* 是其 GC, *Pro* 必须是自由的; 而同时 *vP* 也是其控制辖域, *Pro* 必须受到约束。因为 *Pro* 在 *vP* 里不能既是自由, 又受约束, 因此 (15) 的结构不合法。在英语里, *Pro* 的位置换成自反代词, 而自反代词就会得到 *vP* 里的主语的妥当约束, 结构自然就合法。因此, 与汉语里非作格动结式相对应, 英语的动结式有个“伪自反代词”。汉语动结式拟设的 FP 英语里没有这一概括从汉语里短语动结式显性标记“得”得到独立的支持。邓氏这一解释不失为一个高度限制的参数理论。

尽管邓思颖对英汉动结式的功能短语参数差异的解释相当有说服力了, 但有一个不足, 就是未能对既可以对非宾格动结式, 也可以对非作格动结式进行使役化, 而英语只能对前者, 对后者则不合法作出解释 (Huang, 2006)。对此, 黄正德指出, 汉语里非作格动结式可以分析成非宾格动结式, 这样邓思颖的功能短语参数所面临的问题就消失了。所有的无宾语的动结式都是非宾格动结式, 与英语 “The river froze solid” 一样。非宾格动结式的致使化涉及它的非宾格或者起始分析。这一基本思想的线索来自短语性动结式标记“得”的形式上。众所周知, 词尾“得”是从“得到”“获得”等演化而来的。“得”何以释解为“变得” (become) 或者“使得” (cause), 前者是起始 (非宾格) 之意, 后者具致使之功。因为“-得”既表达状态变化又表示致使关系, 因此 V-得结构中的动词只表达某个 (状态) 变化发生的方式 (manner)。

跟随 Hale and Keyser (1993, 2002)、Rappaport Hovav & Levin (2001) 从事件结构的角度来处理论元结构的方法, 动结式具有一个致使模板, 或者一个表征主要事件的起始模板, 及指定主要事件发生的方式的子事件。起始模板形式如下:

(16) [BECOME <MANNER> [*x* <STATE>]]

(16) 的起始模板即可以解释非宾格动结式 (17a-b), 也可以解释非作格动结式 (17c-d):

(17) a. 妈妈累病了。

b. 卖花姑娘冻病了。

c. 戴宗跑累了。